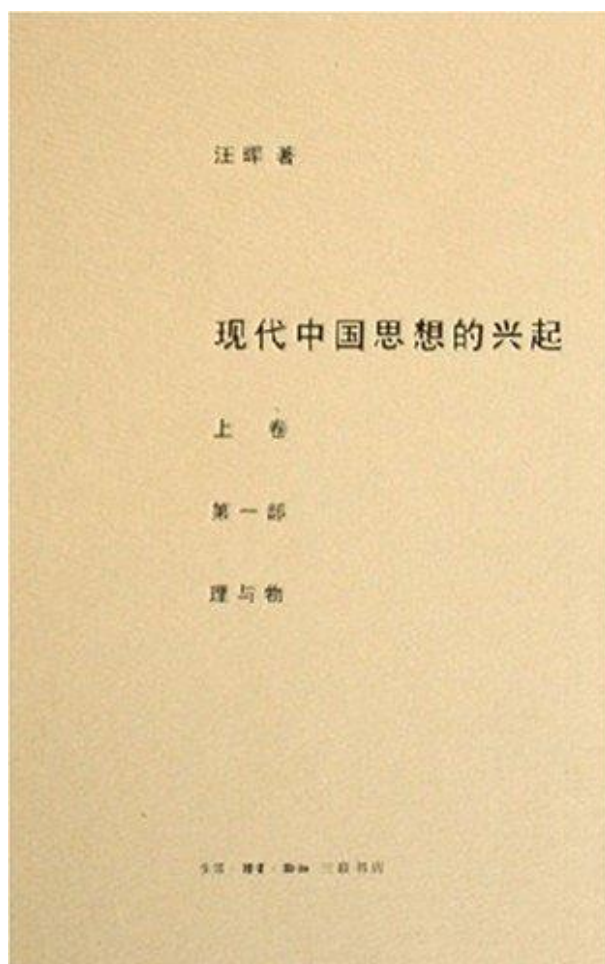


汪晖的生命与思考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当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等多个方面。2015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广东省从化，汪晖老师接受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的访问，讨论关于发展及生态的议题。



刘：汪晖，我还想问一下关于生态的问题，为什么你会那么关注水坝的问题。

汪：这实际上有一个从书本到实践的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自己做这个思想史研究的时候，其中一个课题是对近代科学和科学主义的讨论。我在《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第四卷几乎整卷都是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开始的是比较早的，1990 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这个讨论了。这个讨论一定程度上有它的历史脉络，我觉得是历史跟理论的脉络，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很自然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一个是关于现实，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构造是按照这个结构来的。也就等同于开始了一个对发展主义的基本思考，对于现代化过程的思考。因为我们从 80 年代以来，现代化就是一个最主导的意识形态，当然可以说 100 年来都是如此。我大概在 90 年代的思考当中一个很主要的思想脉络，就是重新反思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这也就不可

避免地追溯到这个过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资本主义的再思考、资本主义的研究来说，我的确认为现代生态危机是跟资本主义发展连在一起的，因此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自己 在 90 年代做这个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科学主义的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是包含这个脉络。因为对于自然的控制，也是对社会的控制的一个方式，这个（是）过去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我也是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对自然的争夺同时等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都是跟它发生关联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反过来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是很早就开始思考的。



费孝通先生

以后卷入到这个生态问题的运动里面，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在 96 年开始编《读书》杂志，编《读书》杂志以后，我对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再思考、发展主义的批评实际上在《读书》里面已经在组织这些讨论。当时我们也组织过几次专门的关于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的圆桌讨论，在《读书》上发表过关于科学主义、人文地理、科学和科学史问题，也包括乡村发展，都涉及发展模式问题，其中也包括生态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知识界对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关注，但是不够重视，我印象中反而是老一代的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问题有思考，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费孝通。他对太湖流域的调查，对太湖的污染情况的分析，另外他强调太湖周围人口密集，人的污染高于其他的污染。这个《读书》后来都发表，没有引

起应有的重视，后来蓝藻爆发各个内湖全部污染。再就是我们曾经发表过一组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是当时对黄河三门峡提出异议的一个科学家，以后在长江三峡问题上，他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那时候在他的晚年，留下了一些稿子，所以我们就发表了他的这些稿子，不是遗稿，当时还在世，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去世后才发表出来，是他的遗稿。还有一篇是直接讨论长江三峡的文章，是他的遗稿，没有能够发表，因为太现实，比较尖锐，没有发表。我自己在《读书》的编辑手记里面也专门写过关于黄万里和这一类生态有关的文字。我们大概在 90 年代，我编《读书》期间也曾经参与过到长江的考察，我们跟一群研究长江问题的人。他们主动来找我，因为《读书》发表了这些文章，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们。所以我跟着他们一起去长江沿岸，去看过，然后也专门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会，一些水利的这些。基本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进一步现代化，为了解决水资源，但同时也发展出怎么样保护生态，这是第二个因素。



已故人类学者 萧亮中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 96、97 年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你、宝强，我们一起，《发展的幻象》那本书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吧？对于发展主义的分析我觉得当时宝强和你的思考已经是比较深入的，比较全面的，那时候参与大家一块儿讨论，以后我从香港回来我们一起编这个书，我记得编这书的过程中《大坝经济学》不是放在我们这一套，也是我拿到后来给了另外一个出版社，最后出版了。金沙江问题的时候，萧亮中买了好多《大坝经济学》分送给这些人。这是之前的

脉络。之后的脉络就是我自己和当时《读书》的关注当中除了生态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对各个民族地区的生态进行观察。黄平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是社会学家，他也跑过很多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田野杂记》去研究各地方地域的文化，因为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跟我以后研究讨论区域这个问题有关系。因为区域是一个生态、人文都综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不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概念。大概是在 2002、2003 年前后，萧亮中来找我，当时他也在《读书》上发表一些文章，他来找我，他说我们谈过关于西藏问题的一些讨论。那么那一年在云南，有一个关于藏族文化和生态多样性的一个学术会议，他们邀请我去，我也说我不是藏学方面的专家，也不是生态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兴趣，他们要我去我也就跟着去了。去的过程中除了参加这些会议，因为那个会议很有意思，除了一部分跟西藏文化有关的，有一批在云南活跃的 NGO，实际上都是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后面分组的一些讨论他们都参加了。当时我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些状况，像大自然协会他们也是在地化的，他们这些干部实际上是当地各民族的成员，所以听到他们的一些讨论。以后我又有机会跟这些藏学家还有活佛一起去德清，然后去梅里雪山，所以一路跟这些，主要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一些人座谈，讨论当地的生态、文化、土地政策等等。



虎跳峡

最后，在那次会议过程中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虎跳峡建水坝的计划。当时就跟萧亮中他们谈过，问过这个问题，我记得走到贡子兰，他们说这个地方可能以

后都要淹掉。（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对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都有影响，再说虎跳峡是一个著名的大景区。我回到北京以后，萧亮中当时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做些事儿，我说我不是特别了解这情况，所以我就跟亮中说你要不先做点调查，你先期的，我后来。他是当地人，所以他留在当地去调查各方面的情况，我也介绍他一些人，当地政府的一些人，让他去跟那些人接触，看看到底什么状况，因为你要说话总要做点调查。我回到北京，他经常打电话说这个状况是怎样怎样，就希望我能做一点事，而且希望能产生影响，要不然整个虎跳峡就破坏了。那我说既然要说话，我又不是这个领域的，我还是觉得很为难，然后我当时还是不管怎么说决定我自己去做一遍考察。这样我就又找了一个机会自己去，当时是夏季，所以（因为）雨水那个地方比较危险，虎跳峡山上掉石头非常危险，而且公路也断。我自己步行穿越哈巴雪山，我一直走进去，沿着这个虎跳峡，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沿着走了一遍。走了一遍后当然也再做一点其他的文字的调查，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情况有了一些比较第一手的接触和了解，也跟当地一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作了讨论。之后我们就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其实当时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环境的 NGO。这些 NGO 当时做了一些地方性的东西，但是始终没有这么大影响的，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次，主要是由于萧亮中的原因，他是当地人，又涉及到金沙江峡谷地区的这些民族的生存状况，所以他在北京跟金沙江之间穿梭往来，其中使得当地的农民，因为它做这个要牵扯到大量的移民，它因为牵扯到这些状况，这个当地的村民开始主动地参与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环保运动来讲，也是一个重要事件。原因是第一次真正的由村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要发言，同时又跟其他的一些从事环保运动的人，还有一些，我们这些并非职业的从事环保运动的人。我们当时做过一个公开信，海内外都有一批人参加，这个公开信的发表，和当时媒体的报导，国内、海内外媒体的报导使得金沙江问题成为很重要的问题。那时候国家在这方面相对的说容忍度比较宽，我记得有一年国务院发改委搞一个电力改革的国际会议，好像是哪个国际组织跟国务院发改委联合搞的。我们当时把金沙江河谷地带一个村民的代表请到北京来，他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而且当时的报纸，像《中国青年报》，都是头版，一个村民的大头像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言，海内、海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点效果。最后，金沙江水坝的建设尤其是虎跳峡项目变更了，它的地址改掉了。金沙江还是需要水坝，它是在上下虎跳还是有，但我们的努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长江三峡水电站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态问题基本上以碳排放为中心的，但我们中国的碳的依赖量高，过去高到 70%、80%，现在比较低了，大概 50%多一点，起码一半以上，仍然是要大规模依靠碳。那我们现在使用碳的清洁技术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这都是事实。但是也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降低）碳排放以后，所以大家觉得水力是唯一的清洁能源，当时还有一些人提出核能源还是可以用的。可是因为福岛危机之后，大家也知道它也是哪一天要爆发了就不得了。一方面是核能的不可靠，它总说是安全的，谁也不敢预估，第二个是有一个碳排放的标准，这样水的压力、水电的压力、水利的压力就变得很大，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说把水电当成清洁能源，可是水电碰到的问题一个是破坏江河的生态，第二个是涉及大量的移民问题。长江三峡当年是这样，现在的这个怒江啊其实都涉及到移民和移民安置。同时这些地区又因为它是多民族地区，它当然也会涉及生产方式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地区的河流有多半是国际河流，它不是一个国家的，还牵扯到国际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客观上讲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现代化、发展主义这些问题，还牵扯到更加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以后我们做过的一些工作。

最近刚刚结束巴黎气候谈判。5 年前在天津也有一次气候谈判。当时有一批人，长期从事这个工作和研究的人提供了这些最基本的数据。我跟郑义生我们一起牵头找了一批人，给当时的中方谈判代表薛正华，也是这一次的主谈判代表，和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各自写了一个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在国内国外都发表了。最近我看他们又有人把这个 5 年前的信翻出来，因为基本的问题没改变其实，谈来谈去基本问题没改变，而且现在说是达成了共识，但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完全没有尽到。中国方面不能说不重视，相比较中美两国的话，中国方面的重视和推进从政府的努力来说、从社会的关注度来说，跟过去相比，那还是做了

大量的工作，这也是实事求是，是有大量资料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作了这么多的努力，国际谈判当中作了这么多的妥协和让步，但是我们的生态还是在持续地恶化，雾霾持续严重，也就是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北京雾霾问题严重

这个不够不是意识的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你只要在这个模式下，只是用修补的方法就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跟欧洲发达国家推卸它们的历史责任，在当代承担的责任也不够。由于它们在这个谈判当中对媒体和 NGO，它们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真正地推进生态的改革，全球性的，包括我们国内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关注生态不仅仅只是一个生态问题，我们通常说的环境问题。那我补充一点的就是当时，我忘了是在哪年，《天涯》杂志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生态》，当时黄平，李陀，少功他们组织了那个会，我不在，没有参加。这说明当时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知识界集体的围绕环境问题发出声音。另外，我们在《读书》组织有关生态的讨论，有一些老先生，他们就说你们这些讨论都走得太快了，这些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意思是说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发展的问题不重要，可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是当时为什么卷入生态问题的一个因素，还有很多。

从虎跳峡实践之后，中国包括北京，媒体和 NGO 对环境的介入越来越多，也引发很多各种各样，客观的说也有不少问题。就是这么卷入的一个过程。

刘健芝：能说一下你的那种人文关怀跟你读鲁迅或者其他有什么关系？

汪晖：我很难具体的讲，跟鲁迅，跟什么都有关系，但也很难说直接的关系。整个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关心自己的社会命运，也关心世界。这是这个时代的基本氛围，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某一种时代的气息，大概要到过后我们回想、比较几代人的时候才会发现你身上的一些东西也跟时代的氛围有关系。我自己比较关心比如民族问题等，这些都跟 20 世纪的政治传统有关。看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他们的生存状态。另外一方面也关心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关系中的位置。生态问题、民族问题都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都不只是生态和民族问题，都牵扯到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或多或少是我自己思考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力。许多的问题大大超出我最早的学术训练，不得不沿着这些问题去阅读、思考和做研究，慢慢这也就成了一个常态。

刘健芝：你研究思想史是想思考当代的问题，能不能说一下。

汪晖：最初涉及到清代的思想，我说过我好想有点倒着走，因为我过去的研究集中在 20 世纪。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五四。因为研究鲁迅，会研究章太炎，严复等涉及到的其他思想家。五四一带，晚清一带，这么做下去。研究晚清思想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涉及更早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在儒学的氛围里。因此这个研究就会展开。

清代的思想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它的内外关系跟宋和明有区别。清代涉及到的蒙古问题、西藏问题、西南地区的问题，在加上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是在演变中的。我在做清代思想的时候，意识到仅仅在旧的，比如以儒学一个框架或者某个一个思想脉络来做，就非常不够。因为研究这段历史，就不得不阅读大量的关于蒙古、西藏等这些地区的東西。理藩院涉及这么多历史，西南院也是如此。这些我们过去注意的比较少，思想上不能说没有涉及，学术上真正的阅读很少。我后来写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的时候，其实一个学术的脉络确实是在研究清代的时候阅读了一些东西，发现清朝要处理这些内外关系的复杂问题，我不得不去读。它也引申到怎么去理解当代的这些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这写线索中还有一个背景是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再思考。在这个脉络下才意识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形势是完全在这个时期重构的。一方面它跟过去的历史有非常深刻的延续性，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也是建立在清代的人口和地域的构造上的，很多处理的方式也是从中国传统里面来的。另外一方面它的基本主权构架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世界关系的一部分，是通过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体制重构出来的。内外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自己在 90 年代开始对科学主义也好、发展主义也好，这套意识形态也好，它植根的基本框架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所以慢慢开始思考怎么去思考民族国家的生成，它跟历史的关系就成了我在一定时期内讨论的中心问题。所以我自 90 年代后期研究清代经学的时候提出破除帝国和国家的二元论，从新解释

中国历史的这些问题。现在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很多人在谈，实际上当时很少。我做的现代中国思想兴起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解释所谓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形成和它在解释历史上的缺陷。现在很多人把我对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分析简化成为用帝国来取代国家这个完全不是我的基本论述。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个二元论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它在理解历史时候的局限性。因为国家的形态在中国有非常长的历史。当我们说中国清朝帝国的时候，实际上它内部既有国家的形态也有今天我们放在帝国范畴内的形态，这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关系。

那时候之所以会对类似于帝国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主要还是它对多样性的容忍程度。在 20 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里面，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就是德国的排犹（太人）这样种族主义的，在欧洲造成了极大伤害，对中国也并不是没有影响。在亚洲地区的日本是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主义为内核的民族主义。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过去我们批判早期帝国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但是也注意到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者其他的帝国体制下，它对少数民族存在过压迫和这些。反而很少出现类似于 20 世纪欧洲排犹这样的极端化的种族主义。这是跟民族主义有关系的。这也是思考现代性问题里面的要素。

我对明清之际的转化，和更早的对中国思想分析，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对现代问题的再思考来展开的。它涉及了不同方面，刚才说到的生态、文化多样性是这个思考中的一个要素，在现实中跟运动界和起来。但还有一些问题不完全如此，我后来关注西藏、新疆问题，写出来是受到事件的出发，写“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很显然是受到 2008 年 3·14 问题的触发。我去新疆也是 2009 年 7·5 事件之后，实际上我在知识领域的思考要比介入这个过程早很多，只不过我不是西藏问题专家，也不是新疆问题专家，我并没有打算完全把它变成一个专门的讨论对象，我还是把它放在对整个中国问题思考内部来看的。但是由于问题的紧迫性，就不得不同时进行知识的介入。怎么理解，你需要提供一个知识的视野。我后来的写的东西跟这个过程有关系。我以后提出所谓的区域作为方法，讲从区域的角度，不是简单的从民族、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好要素，自然、人文、社会要素，不同族群相互关联的要素，不是从单一族群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区域问题是跟历史有关的。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是，在金沙江流域第一次接触明显的问题。云南地区文化多样性非常高，它的生态跟文化多样性密切连在一起。以萧亮中来说，他的家庭里面有白族、纳西族，他夫人是回族，可能还有彝族的因素。他们的家庭当中，包含的成员有四个族群。他的同学，西藏的马建中跟他是好朋友，这些人又是藏族的，当地原来木府到底是纳西族，还是有藏族、汉族，其实不是完全说得清。在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研究所谓多样性，我以后也提出多样性不能解释成一般意义的多元性。圆，一个个的，可是一个圆也是多样的，不能简单地把它单极化。这些问题跟生态和生活方式有关，另外也跟我们的思考有关。当我

们看这些现象的时候从哪出发，是从族群的角度还是甚么角度。我比较追求一个相对综合，这个关系本身构成思考的前提，因为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完全拆解开来，在其他地区也包含这样的方法论要素。当代的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除了当地实际的社会问题之外，也跟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有关。这个理解最后会变成当地人自我的理解，因为这些都变成好像共识，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怎么去重新理解这些关系，甚至理解多样性的概念，因为多样性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概念。多样，你是你，我是我也可以是一种多样。还有一种，我后来提过一个范畴叫跨体系的社会。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也很难说得清楚我是谁。在这个意义上，你离开自己的交往（圈），不能只说自己的父母是谁，祖先是谁，塑造你的是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在这些地区，族群、生态、宗教，尤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连接的要素，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根据，同时也是连接的要素。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把握这些在历史内部的要素。这些思考慢慢变成我思考历史也思考现实关联起来的一个方法。我看历史甚至是阅读经验。我过去常举的一个例子敦煌，有很多发掘的卷子。你要理解这些卷子，就要像考古一样，敦煌有不通顺时期的，唐代中期、晚期，更晚到元朝前后的，以后就没有了。如果你只是看表层，只是一层，里面还有一层，还有一层…阅读一个文本也好，理解一个现象也好，其实是多重的 layers。它开头是一层层的，以后变成一个综合体，因为这是动态的，它毕竟不是墙壁，它是一个活着的要素。这些慢慢成为我思考历史问题、区域问题、生态问题或者这一类问题方法上的视角。

刘健芝：我们知道你除了去欧美，还去很多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国家，这种经验对于你思考什么是国际主义有什么影响？有些人谈国际主义也可以是很虚的，有些人可以说多元性，可以是个很空的范畴。你也会自认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是吧。

汪晖：国际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当然是世界运动历史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传统最深刻的一部分，也值得珍视的一部分，鲁迅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你可以说也包含了孙文。这是从被压迫民族解放出来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共同地位的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国际主义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或多或少这是在过去 30 年当中被否定遗忘的传统，需要重新发掘的传统。

尤其在学术圈，国际主义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正确性，因为民族主义，尤其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学术圈常常被批评。关键的问题是一样，我觉得国际主义也好，关于不同民族的再思考也好，少数民族怎么去理解生态，跟国际主义是一样的，在我看来这个逻辑几乎是一样的逻辑。我的很具体的感觉，随着我接触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这些成为我个人的朋友，我也从他们那学到很多东西。每

个人都有他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看你跟别人的关系。不是你自己可以单独的，而是你建立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些关系的丰富性最后成了你的主体性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很少真正接触到，特别是底层世界，以欧美为主。但欧美有很多人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朋友。以后我有机会去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地区，接触到完全不同的视角。对我来讲有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随着你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跟你接触的朋友们有关的，他们带着你进入对那个问题的关注。你开始因为无知没有能力去真正认识这个社会，多半是这样的运动带着你去接触。而你之所以认识这些人，常常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一些物体。这些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跟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并不是无关，有时候是非常一致的问题，有时候恰恰是由于这个关系造成的。你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互相变成问题。无论如何这些相关性就出来了。你带着这些问题，当然就会介入这些社会的讨论。

我们编《读书》的时候，《读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让不同地区的人都参与到中国学术界的讨论里。有欧美的作者，有日本的、韩国的、其他地区的，国内是台湾、香港，很多学者都参与这个讨论。这么大规模的不同视野介入到中国知识界讨论，我的看法是，一百年来恐怕都很少。这样对于共同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比较少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自己也思考一些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我自己在方法上慢慢发展出的一些东西，去尼泊尔、印度、委内瑞拉或者非洲，常常会从他们面临的问题回去思考中国历史上一些特殊环节、特殊阶段面临的问题，你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去解释中国历史。过去在中国的社会脉络关系中，有些问题恐怕不会这么提、这么看，换到一个很具体的社会冲突语境中，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和政治脉络，有时候帮助我提供了一个历史理解的可能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正是毛派刚刚执政的那年，毛派执政有很多跟中国的相似性。10年人民战争，我们经历8年抗战，然后土地革命，他们是经历了10年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结束后开始议会道路，到底是走和平民主新阶段，还是继续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种争论在中国1945年早就爆发过，在尼泊尔再度爆发。我们围绕20世纪中国这些历史环节，历史学家也有过很多争论，这些历史学家的政治也反映出了政治的争论。从新看待尼泊尔的这场斗争，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阶段的问题。到委内瑞拉，查韦斯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个有魅力的政治领袖，非常善于动员群众，跟群众互动，但他的政党高度的官僚化，很多的投机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维系和推进他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和社会改革方案，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剧烈的挑战。我对他有很多同情，同时也知道他面临的最真实的困难，这个在当时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过头来看中国自己经历的过程，尤其是1960、1970年代或者文化大革命，或

者诸如此类，你去研究中共的政治领袖、政党和普通群众和激进政治，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是帮助你去理解这些要素的。我对于这些地区一方面是关心这些地区的问题，但也时不时把这些问题拉回到我们的历史脉络当中来加以思考。对我来讲，看这些国家、地区的问题，渐渐地不再仅仅是关心别的国家，也关心我们自己，这个分析自我理解方式。渐渐地这些问题之间完全隔开的状态好像慢慢消失，问题涌现的时候，就自然的找到相关性。

我自己观察西方也是，美国、欧洲的问题也是如此，也发现很多的差异和重迭。研究历史、研究政治都会发现很多人强调共同性，或者有的人强调截然不同。但是在某些历史时刻，常常是被看成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中国跟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相似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中国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形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差别也很大，可以你可以找到大量的重迭性的关系。那些方面发生的重迭，哪些方面发生了差异，它在这个关联怎么去思考。对我来说，这变成了一个至少现在来说是一个常态。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当然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专家，但是有时候由于这样的思考，它所带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通常的区域研究可以看到的。在我的视角里，是跟我们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有时候也能产生出这个关联，很有趣。

最近写尼泊尔的文章，回忆当时 2008 年去尼泊尔跟普拉昌达谈话的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他说你好像对尼泊尔的情况很了解，事实上我对尼泊尔的情况不了解，只是很初步的。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觉得，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有过的问题。我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实在的差别，其他的差别。你之所以对它有一定的历史和理论的再理解，是跟中国历史有关的。反过来，当你更深的理解了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形成对自己历史的判断，这个视角是一致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跟这些地区之间产生了更深的关联。坦白的讲，不管我走动多少，主要工作仍然是一个学者的工作。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基础的，做老师，做学术研究，我不想说我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事实上我没有。但是这种联系的纽带的深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你是否每次都要在那个地方才能进行。我在清华组织的很多讨论，我们那个高等研究所的很多活动都是跟这个脉络有关的。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些早的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学科领域里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思考这个世界是有关的。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有不同一般的，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科领域，但他的思考方式不能够完全局限在学科领域里。可是你要超出这个学科领域，不是在学院里谈论科技整合就可以的，这个关联是历史性的，也是你经验的一部分。你只有介入到过程中去，才能成为你思考的一个方法。这样使得你不断触摸你自己知识的边界，就会发现好多东西你都不懂，好多东西都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卡壳（卡住）就不知道了。这

个变成你行动和思考，包括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摄录：欧阳丽嫦

视频整理：李翘志

文字整理：靳培云

全球大学

网址：[http:// our-global-u.org](http://our-global-u.org)